

不京不海集

章培恒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不京不海集

章培恒 ◎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京不海集/章培恒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9-03540-7

I. 不… II. 章…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333 号

不京不海集

章培恒 著

责任编辑/韩结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40 字数 622 千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3540-7/I · 234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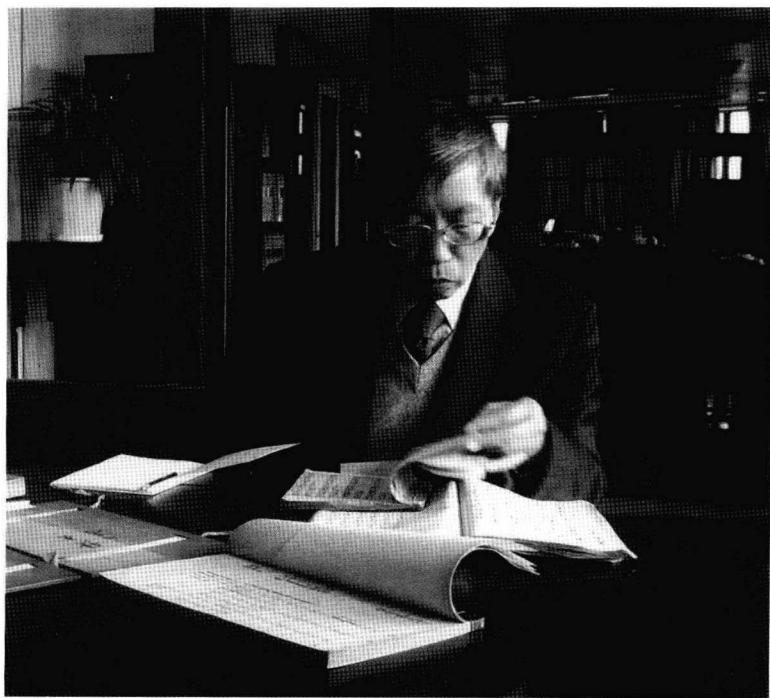
本书是作者数十年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的结集。在内容上，起于先秦，下迄现代，而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为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作家、作品的具体问题的考证；另一类是对若干文学现象的阐述和文学发展线索的勾勒。二者皆出自精思，富于创见。凡所论述，或为原创，或有力地发展、充实了前人之说，绝无摭拾陈言、可有可无之作。至其治学特点，则既秉持科学理论，解放思想，又以实证的研究为指归。是以见解新颖，论据坚实；书中论文很多都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



章培恒先生（1934—2011）



1979年任教日本期间在仙台鲁迅故居前留影



晚年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善本



20世纪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为本科生讲课



给独立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陈建华授课



身罹绝症 读书不辍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

在建国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对于魏晋南北朝——特别是西晋以后——的文学，一般评价较低。在一部很流行的《中国文学史》中，曾作过这样的论断：“魏末和晋初作品”，“已经不如建安作家那样富有现实性”，“但杰出的人物如嵇、阮还保持著建安的传统，仍能精密地结合现实。到了西晋，虽然建安的余音尚在，风力却大大削弱，多数作家已偏重形式和技巧。”“从西晋建立到东晋灭亡的一百多年间，虽然产生了左思、郭璞、刘琨、陶渊明等杰出和优秀的诗人，但形式主义和玄言诗的危害却长期漫溢。”因而这部文学史把晋代作为“著作方面处于形式主义而流统治的时代”。至于南朝的文学，则据这部元序更甚，虽然在艺术性上有所提高，但“很少反映民生疾苦，也缺乏进步的理想”。当时的诗歌或文字，反映生活的面，比之魏、晋来都显得狭窄。“换言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以其思想内容来说，是日益退步。这种评价大同小异地存在于建国以来的几部流行的文字史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一般定论，被大家所公认。本^身对此提出一定的不同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章培恒先生生前自己编定、发表于 1963 年至 2002 年论文 39 篇。分考证与论述两个部分。其中考证部分论文 24 篇,收入章先生早年自编并久已绝版的《献疑集》中除《关于洪昇生年及其他》(该文拟收入《不京不海集续编》)外的所有文章,补入了《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代——以叶逢春本〈三国志传〉为中心》、《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关于〈水浒〉成书过程的几个问题》5 篇论文;论述部分收入公开发表过的论文 15 篇,则均系前所未曾结集者。

本书初排于 2003 年,此后章先生抱病亲自对初校和二校作了审读和修改;除个别文字上的订误外,凡有修改者均在各篇记录发表信息的题注中说明。书中《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问题》、《施彦端是否施耐庵》、《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三篇先前发表或结集时原有附记,章先生生前又为另外四篇加了附记,这四篇是:《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和《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亦均在题记中注明。

章先生论文最初发表时多有尾注,引文出处则往往以简要的括注形式散见于文中。本集为统一体例和方便读者,基本上改为脚注,并增补了一些引文出处。考虑到我们对章先生历时四十年的撰著中所用具体参考文献的版本掌握有限,章先生原文所引与本集所注出处中的文字、标点偶有不合者,原则上保存原文中的引文,以俟日后进一步查考。

本书出版之际,承蒙王水照先生、陈建华先生分别撰写序言或读后感;复旦大学档案馆为本书提供了章先生手稿的影印件;受章先生遗嘱将其论著

整理成集的吴冠文博士，在古籍所硕士张蕾等同学的协助下查对了大部分的引文出处，并校看了二校、三校和四校；因为时间的原因，正式出版前我们又邀请陈正宏、谈蓓芳教授审读了三校和四校，古籍所博士杨丽莹、郑幸，博士生曾子濠、汤志波重新核对了所有引文；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序

王水照

2011年7月9日复旦大学举行了“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会上展示出两部著作：一是《中国文学史新著》修订版，一是这部《不京不海集》的快样书。其时离章先生辞世刚刚过了一个月，我还未从悲痛中走出，看到这两部新著，不禁怦然心惊：《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在病榻上最后完成定稿的，是章先生与病魔顽强搏斗的产物；《不京不海集》中最晚的文字，可能是《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一文的《附记》：“2011年2月25日章培恒于华山医院口述，吴冠文记录整理”。三个月后，他便怀着未竟之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面对这代表他学术成就的一史一论，我分明感受到作者超乎常人的坚毅，立意高远的学术旨趣，摩挲新著，仿佛又看到熟悉的音容笑貌，甚至能感受到他的体温。

章先生是位有鲜明个性色彩、坚持独立精神的学者，又具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人的共同时代特点。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代人从心底里服膺马克思主义，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力求在其理论指导下，开创一片新的学术天地。列宁评价马克思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当时初入学坛的年轻人，读来心潮澎湃，学术使命感和责任心油然而生。章先生的“少共”情结，更促使他刻苦地钻研马列，在我们同辈人中，他对马列著作的熟稔是有口皆碑的。时代的主流理论思潮不能不在这一代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甚至成了不容选择的选择，深刻地影响着学术道路的进程。

在这一代学人的成长过程中，一批学术大师、名家仍然健在，言传身教，给予年轻学子耳提面命、亲炙领会的机会。面对面地感悟大师余荫是这代

人的一大幸运，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幸运，稍晚几辈者就无此缘分了。章先生数次说到复旦的三位老师给他的教益：从蒋天枢先生学习文献学和实证研究，从贾植芳先生处接受鲁迅、接受“五四”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向朱东润先生承受中西结合、力求创新的学术精神。

时代思潮和学脉师承与章先生的独特学术个性取得密切的结合，形成他的学术性格。姑且借用他的两部专著书名来叙说我的感想。

一是献疑精神。他在《献疑集自序》中说：“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集中之作，都颇耗过一番心血，没有一篇是随声附和的；而且我所提出的看法，几乎都跟眼下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见相左……是向被公认的见解挑战。”翻开他的论文集，每篇都从疑点落墨，如《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而施耐庵墓志却是赝作，六朝文学的评价、晚明文学的评价，在他那里得到全然不同的估量，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由于是“向被公认的见解挑战”，引起讨论或争论也是意料中事。然而第一，他所发现的问题是“真问题”，是他在日常研读中思考所得的，所提问题本身，就往往具有学术价值。他在一封讨论李陵答苏武书真伪问题的信中自白过：“盖治文学史数十年，疑端异说充溢胸中，几不可容，今悉于此吐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第二，他严格遵循考证文章的规范，不仅取材丰赡，尽可能达致一网打尽，而且论证严密，尽可能做到滴水不漏。第三，他“献疑”的每个问题，不仅在辨明具体问题是非真伪，而且联系着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像《洪昇年谱》看似单纯的谱学之作，却是为了回答洪昇是否反清等问题的。刘大杰先生早年创作小说，被他的老师郁达夫评为“问题小说”，章先生的论文，实亦可以“问题学术”视之，在质疑中坚守精神追求的自由，在具体论题的背后，存在着更内在的思想。

二是“不京不海”的学术风格。陈子展先生在 1946 年的一首绝句中，有“不京不海不江湖”之句，也是讲学术路数的。京派海派之别，由来已久，颇难确切定义。大抵说来，京派谨慎求实，失之格局局促；海派兼包并容，气度恢宏而又精准不足。章先生以“不京不海”为书名，也可读为“亦京亦海”，在实证基础上追求理论的突破，自谦亦复自信，胸中自有全局在。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文学史著述了，他突破了常见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从单纯作家作品汇编提升为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努力寻找统领全史的阐释结构。他的文学史历经了 1996 年复旦版、1998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新著》及最后复旦版《新著》的修订本和增订本，清晰地呈现出他不断探索、不断反省的思想演进

轨迹。他从认真研读马恩原著出发,提出人性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发展同步的重要判断,以此来解析中国文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继而又钻研文学观念及形式问题,强调追寻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演进变化线索,以此来解释中国文学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原因;最后又提出古今演变问题,回答“五四”新文学是否存在“断层”,以此来解释中国文学一脉相承、不能割裂,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征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日新之境。

章先生的学术道路是不平坦的,前期受牵累于政治,后期被困扰于身体,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他从备受重用的“又红又专”典型,几乎一夜之间被打入政治“另册”,离开了讲台,也离开了学术本业;待到“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正当大显身手,重圆自己学术梦想时,1999年起又罹患癌症,长达十二年之久。正如一位复旦人所咏,“方欣时运转,忽苦病魔缠”,而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正是在与病魔抗争中完成的。荣辱、顺逆都改变不了他对学术的自觉担当精神,晚年的他更显坚执、淡定、弘毅和沉着。这是使我久久感佩不已的。我记起了他给毕业班学生的题词:“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这也是他的自我写照。

追求真理，毋变初衷

——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读后

陈建华

一、引子

这部《不京不海集》为章培恒师生前编定，收录了近四十篇他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文。约在八年前就出了样稿，但迟迟未能面世，因为章先生对自己的著述尚未安心，仍对一些文本不断作修改或补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从篇目来看，这些论文曾对学界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考证、专论或理论阐述，与《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教授合编）互相映照生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个选本，是章先生著作的一部分，集中压卷之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发表于2001年，此后十年间如《〈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述”考》等重要论文并未包括在内，因此推想先生编选此集的原意，似是对自己一个阶段的回顾，如书名所示，在于表明从事学术的独立人格，而在研究方向上则有古今贯通、继往开来之意。虽然天不从人愿，今天先生已不能见到此书的出版，却给后辈留下一份如此丰实的矿产，让我们能想见其风范，步武其踪迹。我这里仅谈点读后的体会，向师友与方家请教。

二、文学与“人性”

众所周知，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人性”为核心，在具体论述中离不开“个人”、“个性”、“自我”等关键概念，如众星拱月，而人性愈放射其璀璨。的确，文学史总是讨论具体的作家，如李白或杜甫，决不会混淆作为个别的存在，但在章先生那里，首先凸现诗人作为有尊严、有灵魂的存在，尤其在与

“群体”——受政治权力操控的充满世俗偏见的群体——的对抗之中凸现出来。《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一文追溯中国文学之源，以“群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为主题，则凸现了屈原这一“个人”的代表。本来“三百篇”无论是官方采集还是据说经过孔子的编辑，尚缺乏作者意识，对照之下《楚辞》意味着中国文学作者主体的诞生。但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探讨屈原是否是一个“爱国诗人”，毋宁说是首先把诗人还原为受到政治、社会条件制约的“个人”，而文学也根植于同文同种而地缘文化迥异的土壤之中。屈原是“爱国”的，爱得深而痴，但如《离骚》这一“上下求索”的精神之旅所示，“爱国”若不以自尊自爱的个人为前提，其所爱之国只是个虚空的躯壳，当他发现君主朝臣及国人的所作所为与他所认知的真理、所崇尚的理想愈远，他毫不妥协、毫不退让，所谓“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最终自投汨罗，死亡成为维护尊严与反抗权利的象征，由是证明“个体”的意义。

诗人那种尊崇自我的精神弥散在《楚辞》之中，如《山鬼》中属于鬼神的女性，不惮艰难，苦苦怀恋自己所爱的男子，“这是一种多么强烈、执著的爱！为了自己的爱，她对于自己的一切都毫不顾惜”。章先生笔底含着激动，进而评论：“而她之能够这样做的前提，就在于她的一切都属于自己；或者更确切些说，她没有意识到她的一切不属于自己。”这里对“自己”的一再强调，意味着爱无可理喻，仅对自己负责，也是一种宿命的选择。与《山鬼》比较，《诗经》中不乏描写爱情的渴望，即使像《将仲子》中的女子，在家庭与环境的压力下，要求她深爱的男子不要再来找她，章先生指出，“这是屈从于集体而牺牲个人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篇论文远溯上古文学，确立“个人”作为文学发轫之初的主体，蕴含精神与情感的丰富层面及其巨大能量。尽管南北的文化土质及其导向各异，在儒家文化走向主流的过程中，“个体”在承受压抑中高扬起抗争的悲壮主调，正如章先生指出，《天问》中诗人对于尧、舜等圣贤已提出“严厉的质问”，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在《从游侠到武侠》一文里“个人”的观念在延伸。古时的“游侠”赴人急难，生死一诺，“所重视、依靠的是个人的人格力量”。他们与贵族阶级或政治当权者相纠结，也对现存秩序造成威胁，在汉代遭到代表儒家主流的班固的指斥，然而得到“受到严重摧残却渴望个人尊严”的司马迁的颂扬。此后“侠文化”分道扬镳，形成泾渭分明的形态的体现。章先生显然与司马迁同调，此文也重在洗发为其所称道的郭解式“布衣之侠”这一路，“他们对社会